



直面社会现实问题
思考中国人的命运

幸福的权利



邓聿文 著

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和更有尊严
拨云见雾指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和方向

周天勇 于建嵘 党国英 王占阳 丁元竹
陈永苗 叶匡政 章文 陈季冰 周鸿陵

联袂推荐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幸福的权利

邓聿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的权利 / 邓聿文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91-0254-9

I. ①幸… II. ①邓…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889 号

幸福的权利

邓聿文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3000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 (020) 83000502

网址: <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张扬个体的权利

追求幸福或幸福地生活是人类的基本目标，也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就世俗价值而言，社会的发展就是一部追求幸福的历史。

尽管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满足一个社会多数人的幸福，是需要一些前置条件的，它包括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物质条件的改善、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合乎正义法则、对异端思想的宽容，以及人的尊严得到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的尊重与保护等。可以说，这些前置条件对一个人获得幸福至关重要，而且它们互为因果。

一个人可以容忍贫困，甚至也可容忍某种程度的不公，然而，不可容忍自己的尊严受到各种外在力量的压迫与侵害。一个人不能有尊严地生活，纵然家财万贯，肯定也是生活得不幸福。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有尊严地生活等同于幸福地生活。

要使人们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涉及到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近年的发展和转型中，政府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已经成了中国当下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即着眼于这一问题，从我近年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取和政府权力以及公民个人权利有关的数十篇文章编辑而成。

和早先现代化国家更多主张和通过发扬市场力量以及公民个体的政治、经济自由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后发现代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更偏好政府作用，以政府一定程度的集权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这有特定的时代因素以及东亚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内。时代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像英、美等早先现代化国家那样，拥有广大的殖民地，以作为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后发现代化国家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机遇；除此外，早先现代化国家的数量也比较少，竞争相对不激烈，

而后来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的数量则多得多，这无疑也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二是现代国家普遍承担的任务要重，责任要大。上述两方面也就决定了现代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只起着守夜作用的小政府状态，必须更大幅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方能应对各方面的挑战。儒家文化的影响则专指对东亚新兴国家而言，在儒家文化看来，国家应该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治。

尽管如此，并不表明政府的作用就越大越好。政府作用的发挥应该是以促进市场力量的发育以及个体自由和福利的增进为前提和基础，如果政府的作用大到压制甚至替代市场，挤压个体的自由空间，或许短期内能够造成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但长期而言，必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不可能使国家具有竞争力的。也就是说，政府只能在自己的边界里活动，不可逾越边界，因为权力天生具有自私性和扩张性，政府力量大，客观上说明政府受到的监督和制约就小。这样，经济增长的成果和国家强盛的结果就会被权力的这种自私和扩张性所吞噬，换言之，微观经济主体创造的社会财富最后会被掌握权力的集团及其亲信所瓜分，广大民众所得有限甚至一贫如洗，从而导致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对立，分裂成两个对抗的集团，这对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绝对无益。无数历史事实一再证实了这点。

所以，为避免此种情形的出现，我们看到，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中的日、韩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从一个大政府的威权体制适时向民主体制转化，收缩政府的边界，让市场和个体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的作用只体现在提供市场和微观主体不能和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包括市场秩序、合约的遵守、对自由和权利的保障等，同时政府的权力也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双重监督和约束，政府严格依法而行，严守法律的边界，相反，公民的行为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就都可以实施。这种政府和个体的关系，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发展状态。而那些没能及时转向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出现了所谓“中等发展国家陷阱”问题而鲜有再进步。

可见，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目前，中国也已经走到“中等发展国家陷阱”的边缘。历史上的大政府主义，更兼之现实中的经济成就，助长了一部分掌握决策权的人对政府的盲目崇拜。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到政府权力收缩的迹

象，有的只是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蚕食本已虚弱的市场自由和公民权利。中国当前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分化、腐败、消费的不足、环境被破坏以及不时发生的群体事件和民众抗争等，都是政府权力不断扩张和公民权利不断收缩的结果。鉴于中国人口之多、国土之大以及地区之复杂，比起其他陷入“中等发展国家陷阱”的国家来，中国一旦跌入该陷阱，可能就永无翻盘机会。

因此，如何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摆脱“中等发展国家陷阱”的宿命，走向民富国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就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本书着力探讨的内容。历史其实早已为我们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只有严格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张扬市场自由和公民权利，中国才会有未来，人民才会真正享有幸福和尊严。假如本书在这方面对读者诸君有所启迪，也就表明它具有些许价值，我也就满足了。

目录

自序 张扬个体的权利 / 1

第一辑 改革与社会公正 / 1

中国未来十年的七大挑战 / 2

改革要以普罗大众的权益为旨归 / 18

需要第二次改革吗? / 22

不能用政府改革代替政治改革 / 26

中国改革已陷入滞胀 / 29

改革须从考验公众承受力转向让人民受益 / 32

探索改革风险的分散问题 / 35

限制官员权力已成中国改革急务 / 37

初级阶段需要强调公平正义 / 40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实践普世价值 / 43

居危思危看待中国的发展 / 48

第二辑 国家责任 / 51

如何才能让人民生活得幸福和有尊严 / 52

为什么要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 55

改变利益失衡的格局不能再拖 / 58

恢复宪法的迁徙自由已迫不及待 / 61

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是善待自己的国民 / 64

中国需要健康的城市化 / 67

加速给农民还债 / 70

将公民参与权作为公共品向社会提供 / 73

权力“裸行”才能消除“裸官” / 75
民生需要民权来保障 / 78
避免公共决策按“需”索取 / 80
户籍制度改革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表 / 83
如何化解越来越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 86

第三辑 政府的品质 / 89

中共不应有自己的利益 / 90
政府就该天生被怀疑 / 93
从善如流是政府的基本品质 / 96
不能以追求GDP的方式去追求幸福指数 / 99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政治决断 / 102
管治危机与公共治理 / 104
反思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 108
政府应学会与民间组织“和平共处” / 111
部门利益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最大障碍 / 116
城管可不可以取消？ / 119
建立制度化回应群众诉求的机制 / 122
危机时期更要公开政务 / 126
用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反腐成果 / 129
不能让政府失信一再挑战民众敏感神经 / 131
谨防国企高管变身为政治企业家 / 134
社会信任解体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结果 / 137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破茧而出？ / 140

第四辑 公民权利 / 145

如何对人民赋予的权力保持敬畏之心 / 146
公民社会的成长及NGO的作用 / 149

民间的生成及其力量 / 156
“网络问政”与政府善治 / 161
官民对立中的公民权利诉求 / 166
非正常上访与非正常权利 / 169
官员就应该习惯被“骂” / 171
少生4亿人的代价问题 / 174
“公民”不只意味着反对 / 177
“微博打拐”中的公民行动 / 180
多数人意见也不能否决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 182
“人跪狗”与底线道德 / 184
对职业乞丐的宽容就是对自由的保障 / 186
警惕“伪民主”剥夺流动人口的自由 / 188

第五辑 世道与人心 / 191

“绿坝”与国家“父爱主义” / 192
公权力的私有化导致拆迁现代版“株连九族” / 195
今天你公款按摩了吗 / 198
谁吃了有毒的三鹿奶粉？ / 201
中国的官二代、身份继承与社会断裂 / 204
群体事件下的国企改革 / 207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平民的感觉 / 210
从经济学家的“吐痰论”到县委书记的“烟灰缸论” / 213
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前提 / 215
博士与博仕 / 218
利益集团挟持了中国的教育 / 220
“中国教育成功”与乡村女教师的卖淫悲剧 / 222
“赢家通吃”的现象应该打破 / 224
当腐败政策化时 / 226

故宫丑闻是官办文化下的蛋 / 228

第六辑 法治的信仰 / 231

用民主克服政令不通 / 232

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 234

法律的权威为什么不足 / 236

如何建设法治政府 / 239

从党内反腐转向法治反腐 / 244

做实人大的决定权 / 250

赵作海案与国家赔偿制度 / 252

为什么反对“张茵们”只为本阶层代言 / 255

政协不应成为商人俱乐部 / 257

“钓鱼执法”与中国的分利集团 / 260

听证会的生命在于程序公正 / 263

以公共的政治参与化解群体事件 / 266

应立法确保流动人口国民待遇 / 269

人大质询政府应成为一种常态 / 272

后记 / 274

推介语 / 276

第一辑 改革与社会公正

历史上不成功的改革，说到底，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一项改革若要顺利推进，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而要让人们拥护和支持，改革就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至少是不能过度损害，使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中国这些年来的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动力渐失，根子在于改革者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要求。

中国未来十年的七大挑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要有，在国力昌盛、民众富裕的承平时代更要有。忧患意识是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可宝贵的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既要抓住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机遇，又指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30余年的光阴只是一个瞬间，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不短。这30余年的改革开放，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并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2010年上半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尽脑汁时，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并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堪与盛唐媲美。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在此种表面的强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事实上，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着比以前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大爆发的临界点上。就国内来说，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实现经济再平衡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

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世人都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权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减弱甚至还有加强；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2010年以来，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中断的，因此，这也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2010年又通过了有关中国汇率的法案，人民币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而它们大部分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

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

从中国政府4万亿元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复。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更大。

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以及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等方面。实际上，从“九五”计划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如今“十一五”计划即将完成，发展方式依然如故。现在外部形势已经变化，假如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不大，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一样，以同样的破坏力度甚至更大的破坏性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如此，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悲剧。

挑战之二：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于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何种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

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的不公上只会有过之。无论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目前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出了一个数据，他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表现为全方位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比1999年的0.437高出近4个百分点。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0.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并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至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正处于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取决于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控的范

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不能不说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收入差距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当年的设想，并称这是改革的“两个大局”。我们现在“先富”有了，即第一个“大局”大体实现了，然而，“共富”即第二个“大局”的实现还显得遥遥无期。导致第二个“大局”实现不了的根本原因，是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获取财富。这虽然有历史的具体的因素，可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实行如果不伴随对资本和权力的节制，将会放大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即自动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两个制度根源。

我们在钦佩邓小平具有远虑的同时，不能忘了他的警告。未来10年，必须把解决收入和贫富差距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否则，对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挑战之三：反腐倡廉道远

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不能因为其“老”，我们就可以对它放松警惕。因为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且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绝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黑格尔在此实际指出了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的确，当贪腐成为一种文

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时，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腐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说得严重点，我们今天就是这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处决的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可能是改革前因贪污被处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了。然而，改革以来被处处的各级腐败官员，不下数百万，这其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下至没有级别的村长。某地一个小小的基层科级干部，其贪污、挪用的赃款竟然高达3亿多元，创造了中国腐败金额之最。

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毁于腐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并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腐败在中国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占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精英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率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鉴于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存在民族分离的势力，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借口。

所以，腐败造成的物质耗损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它会带来人心的丧失。从中国的情形看，腐败的严重泛滥已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例如，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与暴力集体抗议，这削弱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内部治安方面的额外支出成为必要。

从腐败的通常逻辑来分析，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